

坚持开放式办学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刘道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基本国策，十二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如何才能适应并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了一个既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又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改造封闭式办学模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过来积极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在，我们在经济上执行的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这是实现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成果和资金不行。而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在某些方面却仍沿袭了传统的封闭式办学模式，这同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是不相适应的。

所谓封闭式办学模式，或者说封闭式教育，乃是在密封、闭合的系统中对受教育者实施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称之为经院式教育。我们知道，在封闭系统中空气不能流通，在暗室里，阳光不能照进，因而在这种环境里，生物难于生存，即使勉强生存，也不可能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同样，在封闭环境中实施的教育，必然是学术思想窒息，信息不能沟通，因而培养的人才也必然缺乏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

封闭式办学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把现存的一切视为完美的终极，只求墨守成规，不愿创新开拓；在培养目标上，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在教育功能上，封闭式学校仍然停留在学校只是培养人才的单一功能的阶段，而看不到大学已经担当起了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多功能任务；在外部关系上，封闭式办学是孤立的，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更没有起到超前的作用；在人才的培养方式上，则是手工业式的。很显然，按照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必然缺乏适应性、创造性和竞争性。

封闭式的办学模式弊端甚多，危害很大。一是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为现代化建设输送足够数量和合乎质量的人才，拖了四化建设的后腿。这里牵涉到人才学非所用的问题。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大家都在检查知识分子专业对口的情况，解决学非所用这一问题。应当承认，当今社会上少部分知识分子确有使用不当的情况，对他们落实政策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教育部门从毕业生学非所用这一状况中应当得到什么启示呢？我们应当对学

非所用作出正确的分析。到底是学非所用，还是所学无用？是用所非学，还是用所未学？是使自己所学的专长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大口径，还是要经济和社会发展来对自己专业的小口径？结论本来是清楚的。大学本科是培养通才的，不应当过份强调专业对口。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也不在教师。这正是封闭式办学所造成的恶果。二是教育内部的小而全和部门所有制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存在一些矛盾现象：既感人才缺乏，却又浪费很大；高等学校数量不少，但招收的学生不多；教育经费本已严重不足，但使用效益却不高，甚至有很大浪费。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封闭式的办学模式。为什么人才不能流动？为什么专业越办越窄？为什么学校招生数量不多？探本溯源，问题不在于（至少不完全在于）办学的部门，而在于办学的模式。前一段，对于部委办学是否合适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取不取消部委办学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关键在于要打破部门所有制办学的封闭式模式。三是封闭式办学与新的技术革命极不相适应。在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下，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是关键性的资本，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而封闭式办学的最大弊端就是阻碍信息的获取、分析和传递。因此，不打破封闭的模式就不能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就会使我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同先进国家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差距拉大，最终将会贻误四化建设。

封闭式办学模式的形成，既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从政治上说，它是我国长期奉行的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的产物；从经济上讲，它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从思想上看，它是封建思想意识对教育影响的表现。

当前，全国教育战线正在学习和贯彻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各项教育改革的试验，在教育改革方面，要做的事很多，不过，如何使教育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关键问题。改造封闭式办学模式，也在深入广泛地进行。这是一项重要的综合性的改革任务。只要我们按照教育体制改革的精神办事，明确了方向，扎扎实实地工作，我们的改革就一定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开放式办学的基本特征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僵化状态向充满生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转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高等教育必然要有一个相应的转变，即由封闭式办学向开放式办学转变。

所谓开放式办学，就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与社会发展出发，正确处理内外部各种关系，使教育适应于世界形势和未来的需要。总而言之，符合“三个面向”的教育，就是开放式教学。它的目的是：解放思想，克服统得过多，管得过死，部门和地区分割的弊端，以便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出高质量的人才、高水平的成果，从而更好地为贯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服务，进一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

开放式办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它至少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七个基本特征：疏导为主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型的人才观；灵活机动的教学制度；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教学体系、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各种形式的教学、科研和生产联合体；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民主和自由的学风。当然，开放式办学的内容，还远远不止这些。但

如果做到了以上七个方面，那也就可以说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校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围绕开放式办学，不断探索，初步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们仅谈谈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坚持疏导为主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开放式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不仅在教育工作当中长期受到“左”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也受到“左”的干扰和破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左”的表现主要是：对学生，严加防范，只准循规蹈矩，不得轻举妄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辄把有一些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学生作为反动学生批。除此之外，说教式的、注入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还有许多表现。因此，我们要搞活教育，就要搞活思想工作，使其适应于当前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根据我们几年来工作的实践，搞好新形势下的思想工作，就要坚持疏导为主的方针。这就要求相信学生、依靠学生、尊重学生的首创精神。为了坚持疏导为主的方针，我们主要是靠教师教书育人，实行导师制，以此代替了政治辅导员制。在作学生工作中，我们要确立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学生是学校的真正主人。我们学校的领导、教师、后勤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学生服务的。确立了这一个观念，我们就应该充分依靠学生，发挥他们在教学改革中的作用。

第二，树立新的人才观。所谓人才观，就是指导制订衡量人才规范的理论或观点。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衡量人才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衡量人才的观点。在几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大学的人才观都是以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的尺度，我们叫做“知识型”的人才观。从五十年代中期，国外提出了要培养大学生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智能型”的人才观。我校的教学改革，首先就是从转变人才观入手的，较早地在校内提出了培养“智能型”的人才。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我们感到“智能型”的人才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浪潮的挑战，于是我们又提出了“创造型”的人才观，大力培养我们学生的创造能力。“智能型”与“创造型”是有差别的，智能不等于创造。此外，“智能型”只是对教育客体的要求，而“创造型”则既是对教育客体的更高要求，又是教育主体肩负的使命。也就是说“智能型”人才是主体型的，“创造型”人才是主客体统一型的。从教育未来学的观点看，未来的人才观又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曾提出“审美型”的人才观。这就是说，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里，各级教育已得到完全的普及，教育不再是一种“苦其心志”的活动，而是人们自觉的审美需要。综上所述，我们曾把人才观划分为“知识型”、“智能型”、“创造型”和“审美型”。应当指出，这几类型不是割裂的、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是，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我们所说的人才观，是又红又专的人才，他们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四化而献身的精神。

第三，实行灵活机动的教学制度。教学制度与办学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搞活教学制度，是不可能实行开放式办学的。正因为如此，几年来，我们围绕着改革教学制度作了一些工作，总共实行了几项新的制度，即：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制，学术假制，导师制以及允许优秀学生冒尖，允许有特殊爱好的学生转系和转专业，此外，还设立了大学生纪念奖学金，大学生业余科学研究基金等。以学分制为例，我们已实行六年了，结果不仅调整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先后有59人提前毕业，从而缩短了教育周期，提高了经济效益，达到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的。再以转专业制为例。我们允许学生转系、转专业。我们这一决定，是从尊重学生志趣考虑的，同时也考虑了市场调节的经济规律在教育上的作用。自1981年以来，我校共有

85人转系、转专业。有的是文、理内部转，有的是文和理互转的。从实践的效果看，转专业者仅占学生总数的3%，全部都是成功的，不仅没有动摇大多数学生的专业思想，而且培养出了一批冒尖人才。

总之，开放式办学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高等教育如果不采取开放式的办学方针，就不可能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就不可能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高等学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大有可为

在一切社会活动中，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象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如此密切的了。难怪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一致认为：“大学为企业提供的是智慧”，“企业的生命血液是大学进行的基础研究工作”，“未来的经济将取决于研究、投资和人才的培养。”

大量的事实说明，高等学校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中是大有可为的。高等学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内容很多，从总的方面讲，就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思想。关于出人才、出成果，已经讲得很多了，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关于出思想的问题，还讲得不那么多，至少还不是为很多人所明瞭，因此，本文想着重讲讲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我国长期是见物不见人，重理轻文，重技轻管，重硬轻软。高等学校除了提供有形的人才和成果以外，还蕴藏着一种极为丰富的资源，这就是思想。问题在于，我们恰恰对这种资源重视和利用不够。我们提出要出思想，正是希望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布克曾说：“大学的使命是提供一个自由研讨和探索真理的场所”，“大学承担着伟大的职责：它在寻求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体现其价值”。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强调了思想的作用。大学是知识密集的地方，也可以说大学就是一个思想库。大学发挥出思想的作用，就是要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论证，为各项社会服务提供咨询，为一切发明创造提供新思想。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校也力图改变学校与经济和社会脱节的现象，努力为经济振兴服务。几年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多层次、多形式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过去，我校是一所文、理综合大学，现在已改造为文、法、理、技、管的多科性综合大学。过去，我校仅有通用的长线专业，极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近年来，我们新办了三个院、十二个系和二十一个新专业，从而加强了短线和填补了空白，满足了国家的急需。过去，我校只有四年制本科，现在又设立了二、三年制的专科。过去，我们只有全日制，现在办了函授、夜大学和自费走读班，教师在册人数超过3,000人。文革以前，我校本科生只有4,500人，现在已达6,500人，比文革以前增加了69%。过去，研究生仅有50多人，现已逾千人，比文革前增加了20倍。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看到：我校培养人才不仅数量和品种发展了，而且质量也有了提高，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

第二，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参与和开发科技市场，把科技变为生产力。七年来，我们共完成了328项成果，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38项，获得各级奖励的项目110项，占科研成果总数的33.5%。目前，已推广的成果有25项，有待推广应用的项目近50项。我们要在充分重视应用技术开发研究的同时，绝不忽视和放松基础研究。应用技术一旦使用，就变成今天的生产力，而基础研究是明天的生产力。作为综合性大学，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这两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服务。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各地都在讨论和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我校有关的系，先后参加了湖北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多次参加了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讨论，召开了全国廿多个县级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还准备与有关单位共同发起召开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讨论。从已经参加的战略讨论来看，高等学校确实可以起到智囊团的作用。我校经管学院副院长李崇淮教授，对武汉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出了“两通”起飞和“中心开花，敞开三镇”的战略设想，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他的观点经过论证已被采纳，并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写进了中央文件。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武汉市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特别奖，市长吴官正亲自给他戴上了光荣花，并称赞他是“为武汉市发展献策的智多星”。

第四，建立多种形式的学校、科研、生产联合体。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高等教育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有：大学与企业究竟是什么关系？大学是否应当与企业签订合作研究和咨询协议？大学教师是否允许参与开发企业的活动？尽管这些争论并未完全结束，认识也还未能趋于一致，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大学要想脱离和独立于社会和企业之外，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大学与企业的联合，既是企业发展与竞争的需要，也是教学改革的需要。联合的双方虽各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但是它们可以寻求合作互利的共同点。一般来说，大学主要是为企业输送人才，提供成果和技术，帮助企业竞争；而企业主要是向学校提供资金，提供试验或实验场所，帮助学校发展。

在世界学产联合和国内企业求贤若渴两种力量的推动下，我校与三个经济城市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我校除了科技开发服务总公司以外，还成立了招标与投标咨询公司、南方经济预测公司、环境保护机械公司、汉深电子公司、汉冶冶电子公司。这些公司的成立，没有影响学校中心任务。它既挖掘了学校的潜力，又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五，广泛地开展各种咨询活动。咨询是一种智力劳动，经济和社会部门都需要咨询服务。咨询应当成为一种产业，要动员一切有咨询能力的教师参加到这项有益的工作中来。武汉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咨询工作，较早地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有近百名专家、教授参加了咨询委员会和专业咨询组工作。几年来，从宏观到微观两方面进行了许多咨询活动，收到了很大的效益。仅就我校而言，三年来，先后对武汉市提出了“两通起飞”、“招标与投标”和“绝对成本控制法”等三项咨询。1983年，首先在武汉洗衣机厂试行招标政策，当年使这个老大难厂一跃而为先进的企业，利润增加两百多万。第二年，在全市八个企业推广招标办法，由于采取了招标与投标办法再加上其他的措施，使当年增加利润1,300多万元。灿烂的改革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所以，市长吴官正同志说：“武汉大学为武汉市出了三条妙计。过去说，一字值千金，现在是一计抵万金。”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大好，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吹进了每一个行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在顺利地贯彻，已经开始出现了拥有买卖双方活跃的科技市场。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也一定会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开放式的高等教育制度！